

价值闭合：AI 时代“无法启动的意义”的一个先验批判

当代意义困境的根源，不是先在意愿主体的生成能力因外包而退化，而是那个能主动做出含糊价值选择的“意愿主体”，在其诞生所依赖的价值摩擦被系统性抹除的条件下，根本无法被触发。

作者 阳涌 · 约 2.0 万字 · 发表于 2026年7月14日

摘要

本文提出并论证一个关于AI时代人类意义困境的新解释。与将困境归因于“能力的废用”（以卡尔、特克尔等为代表）不同，本文从先验批判路径切入，识别出此类理论共享的一个未经审视的预设——在一个“无答案”的世界中，存在一种先在的、完整的“意愿主体”。本文的核心判断是：当代意义困境的根源，不在于一个先在的“意愿主体”的生成“能力”因外包而退化，而在于一种被命名为“价值闭合”的新环境结构的形成。价值闭合，指外部系统在个体尚未形成任何原初的价值关切之前，就已将所有可能引发摩擦的“错误”“含混”与“无用”体验，作为待优化的缺陷而消除。在此闭合结构中，意义生成的必要条件不是“意愿能力”被“用进废退”，而是那个能够主动做出含糊的价值选择、并将含混主动拉扯为问题的“意愿主体”，在其诞生所依赖的价值冲突经验被系统性地预先抹除的条件下，根本无法被触发。本文通过教育领域的应答系统与亲密关系领域的算法匹配两个详细案例，逐层展示这一消除机制如何运作，正面回应罗萨、韩炳哲、哈贝马斯等理论对手，并给出严格的证伪条件。

关键词 价值闭合；意愿主体的发生；价值摩擦；AI时代意义；先验批判

一、引言：一个问题框架的裂痕

人工智能正以惊人的效率接管那些曾被视为人之为人的核心任务。面对这一进程，一个日益被关注的深层问题浮现出来：在技术创造的前所未有的丰裕与便利中，人们越来越难以感到“这一切是值得的”。对此，一种颇具解释力的诊断框架已经出现——我们可以称其为“能力停滞论”[2]。这一思路的核心主张是：我们曾把与意义生成环环相扣的判断大量外包给外部系统，而用以亲自将生命经验转化为意义感的那套心理功能，因长期被代劳而趋于停滞。从卡尔（Carr, 2010）对“浅薄”的忧思，到特克尔（Turkle, 2011）对数字时代亲密关系衰变的观察，再到罗萨（Rosa, 2005, 2016）关于“共鸣轴”在现代加速社会中磨损的分析，这一框架在二十年间不断获得新的论述支持。

本文试图论证，能力停滞论虽然深刻地诊断了某些现象，但它所依赖的根本预设，恰恰遮蔽了一个更深的悖论。能力停滞论的逻辑是功能性的：一个能力，因为你不用它，所以它退化了。这个逻辑预设了一个稳定的、先在的主体，这个主体拥有某套完整的“意义生成器官”，只是由于环境的过度代劳，这套器官的功能衰退了。由此，解决方案自然指向“重新激活”这套被闲置的机能——在有意识划出的保护空间里，重新锻炼那些因长期外包而钝化的心理肌肉。

然而，如果我们暂时悬置那个“有一个先在意愿主体”的预设，一个更尖锐的问题就浮现出来。在当代最典型的意义匮乏案例中，当事人所处的困境，并非是有强烈的愿念想做某件事、却因为缺乏含混耐受或错误反刍的“能力”而做不成，而是他们在一切可选之事面前，都听不到任何内心愿念的声响。他们不是“想做却坚持不下去”，他们是“不知道有什么值得做”。他们不是“怕犯错”，他们是在一个被预先清理了所有潜在价值冲突的环境中，从未体验过“有什么东西让我觉得不应该忽视、让我想要为它做些什么”的驱动力。在他们成长的漫长时光里，外部评价系统不仅替他们“处理”了含混和错误，更关键的是，在任何一个可能激发起原初关切的混沌地带，系统都已预先将其平整为了一条清晰的、可作答的路径。

这引向一个根本性的区分：能力停滞论问的是“为什么那个能生成意义的内在器官不工作了？”，本文问的是“为什么那个器官的所有者——那个能够主动做出价值判断、主动与外部世界产生个人化的价值偏斜的‘我’——没有出现？”。

这正是本文试图把问题推进到更深处的工作：从“能力的退化”走向“意愿主体之被触发条件的消失”。本文将沿着这一追问，逐步展开一个基于先验批判的完整论述。

二、逮到底层先验：从“能力停滞”到“意愿未触发”

2.1 能力停滞论的逻辑结构

为了识别能力停滞论所隐蔽的预设，我们需要首先将其论证逻辑加以严格重构。这一类理论——尽管在具体术语和侧重点上各不相同——共享着一个三层论证结构。

第一步，区分出一套相互耦合的心理功能：在含混中持续注意的能力、从错误中重新定向的能力、对“无用”之事倾注心血的能力。它们不被视为三种彼此独立的技能，而被理解作为一种耦合机制——含混中的持续关注为错误的深刻反刍提供时间窗口，而从错误中重新定向的能力又反过来加深了对含混的关注质量；向“无用”倾注心血，则为前两者提供不被效率标准裁断的保护空间。这三种功能在交互运转中才能产生意义感；一旦耦合断裂，即使单项“分数”不低，整体功能也会停滞。

第二步，将该耦合机制与相近的心理学概念划清边界。例如，它与“容忍模糊性”不同：容忍模糊性关注的是情绪耐受（在不确定中不产生焦虑），而此耦合机制关注的是在含混中主动地“做”——持续与对象保持关联，让意义从中缓慢结晶。它与“成长型思维”不同：成长型思维指向“进步”（错误是进步的阶梯），而此机制指向“关联”——从错误中读取自己与对象之间个人化的、不可替代的联结。它与“内在动机”也不同：内在动机源于活动的趣味和满足感，而此机制的驱动更为“坚硬”，是一种“我愿意为它做点什么”的意愿外溢，即使过程费劲、沉闷、令人沮丧。

第三步，基于上述区分，提出“外包导致功能停滞”的发生机制。这一机制诉诸一个古老的器官使用原理——“用进废退”：长期静脉营养，胃的蠕动功能就会衰减。同理，当外部系统长期替个体完成从含混到判断的整个过程，那套耦合机制就因“长期未被需要”而进入功能停滞。这解释了为什么在一切皆可由外部代理的时代，个体反而更难感受到意义的在场：不是外部系统直接剥夺了意义，而是它让那套本应持续运转以产生意义感的内部机制进入休眠。

这一论证是精致而有力的。然而，正是在它最核心的“用进废退”类比中，本文识别出一个隐蔽的、从未被质疑的底层先验。[3]

2.2 先验的识别：那个被预设的“意愿主体”

这个先验是：存在一个先在的、完整的“意愿主体”[4]，它天然地渴望去关注、去反刍、去倾注心血，只是在应对外部复杂性的过程中“主动”选择了外包，而后因“长期不使用”导致这些能力的功能性退化。

“用进废退”这个类比完美地暴露了这一预设。它预设了一个“消化功能本来健全、只是被外部营养液闲置”的胃。将其移植到心灵领域，它就预设了一个“意义生成功能本来健全、只是被外部标准答案闲置”的心理器官。外部系统的角色被框定为“代劳者”——它替一个已经存在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主体去处理了那些麻烦的过程。由此，困境被描述为：主体“想要”获得意义，但其已经退化的“器官”无法完成从体验到意义的生成过程。

然而，如果当代困境的核心关窍恰恰不在“器官退化”，而在于那个能主动产生价值偏斜、能对某个具体的对象产生“我想要为它做点什么”的冲动、能将某种含混经验识别为一个重要问题的“我”，从未真正成形呢？如果外部系统不仅仅“代劳”了一个已存在的判断功能，而是在个体成长的每一个可能触发主体性偏斜的关口，都以一套预先准备好的高效解决方案，抢先一步填平了那个能够激发出“我到底在乎什么”的困惑的缝隙呢？

这就是本文所识别的底层先验：困扰当代人的，不是某个生成能力的“器官”的萎缩，而是“谁在思考”、“谁在提问”、“谁在感到困惑”的那个“谁”的发生过程，被系统地短路了。问题不是“我的意义器官不转了”，而是“我还不是一个能够拥有意义器官的、完整的我”。

这一先验一旦被说破，整个困境的起源就必须重新书写：不在于主体的“外包”行为本身，而在于一套更为隐蔽的外部系统——它全方位且带有善意地，消除了令这个“我”得以被触发的、那个充满了价值冲突与费解之谜的“环境”。这迫使我们的追问发生一次根本性的转向：不再问“环境如何让一个已有的主体丧失了能力”，转而问“什么样的环境结构，会让一个能够做出不含糊价值选择的主体，在根本上无法被生成？”

三、两个发生现场：摩擦如何被消除

在回答这个转向后的问题之前，我们需要进入两个具体的“发生现场”，去观看那个使意愿主体无法被触发的机制究竟如何运作。这不是要给现象贴标签，而是要进入机制运作的微观层面，让概念从事物的矛盾内部“长出来”。

3.1 教育现场：一个未被触发的意愿

下面展示的是一个典型但并不极端的场景，它综合了多个真实教育个案的共同特征，用以揭示一种系统性的消除机制如何步步运作。[1]

一个十五岁的男孩，我们称他为L。在小学阶段，L曾对昆虫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他会在放学后独自去公园翻石头找西瓜虫，会在纸上画满形态各异的甲虫，会问老师“蚂蚁的社会为什么没有国王只有女王”。这些行为在当时被老师和家长视为“挺可爱的小爱好”，未被禁止，也未被特别鼓励。

进入中学后的第一个学期，生物课要求每人完成一份课外观察报告。L想做一个关于小区土壤中昆虫种群密度的长期观察。这个设想本身包含着系列需要他自己去摸索的问题：如何划定观察区域？如何标注和计数？什么时间观察最合适？怎样判断不同季节的密度差异是真实的而非偶然的？这些问题没有现成答案——它们正是那种可能触发原初关切的“摩擦”。

然而，在设想的现场，摩擦被系统性地消除了。第一重消除来自作业机制本身：老师下发了一份详细的“优秀报告评分标准”，其中明确规定了格式（摘要、方法、数据、分析、结论）、评分权重、以及“建议选题”。L的意向选题不在“建议选题”之列，且其开

放式的探索方法（需要在几个月内持续观察，数据不确定性高）与评分标准所要求的“可在一个月内完成并产出清晰结果”不匹配。指导老师善意地建议他换一个更“可控”的选题：“做昆虫标本观察吧，数据清晰，好写，分也拿得到。”L同意了。第一个摩擦点——需要一个自己的判断来决定坚持还是放弃——在他尚未意识到这是一个需要他来判断的选择之前，就已经被“好写、分高”的最优路径悄然绕过去了。

第二重消除来自备考系统。标本观察报告得了高分，但过程中主导的不是他原初对昆虫的关切，而是对评分标准的精准回应。在接下来的两年里，那种翻石头找西瓜虫的经验再也没有发生过。不是因为他“失去了兴趣”——那个兴趣从来没有充分发育成一个稳定的、有方向的力量。它只是一个微弱的偏斜，需要在一次次被激发的具体情境中、在一次又一次的含混纠结中，才能慢慢凝聚成某种属于自己的方向感。然而，每一次这个偏斜可能被学习生活重新激活的瞬时——比如生物课上的一个开放式问题、暑假计划中的一个自选项目——都被一套更高效的选择机制抢先占位：竞赛集训、升学加分、标准化备考。L没有“放弃”任何东西，他只是从一个选项被导向了另一个选项，而所有的导向都显得如此合理、如此为他着想。这正是此机制的高明与根本困境所在：它不是在剥夺一个人已有的热爱，而是在任何热爱尚未成形之前，就已填平了它得以成形的那些凹陷。

第三重消除来自对话场域。L并非没有困惑。高二时，他对母亲说过一句：“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学这些。”母亲——一位深爱他且愿意帮助他的家长——的回答是：“你现在觉得累，坚持过去就好了，考上好大学就都值了。”这不是一个错误的回答，它是一个“无法抵达L问题”的回答。L的问题不是累，是“我不知道学这些与我自己有什么关系”。但母亲听不见这个区分，因为她自己的生活经验告诉她，“坚持”和“考上”就是全部的答案。真正能够接住这个困惑的对话，需要一个人反问他：“你问的是‘不知道为什么要学’，那你想象过什么样的事会让你觉得‘值得学’吗？”——这种反问他人的反应无法从关心和爱中自动生成，它需要对话者本人也经历过类似的追问、拥有容纳这种无解的耐心，而不是用现成答案去填平它。在L所处的教育环境中，这种对话者——一个不会立刻回答他、反而让他更困惑的他者——从未出现。困惑不是被解答了，而是在它尚未充分形成一个尖锐问题之前，就已悄然消散在那些“都这样”、“熬过去”的回声里。

L后来考上了一所不错的大学。如果被问到“你的兴趣是什么”，他会说“没什么特别的兴趣”。他不是在谦逊，而是真的听不到任何内心的声响。他不是“不想做”，他是不曾遭遇到一个能够迫使他生成出“想”的那个岔路口。在L的生命经验里，核心特征不是“被挫败”，而是“从未被卷入足以触发选择冲动的冲突”。在一个没有岔路口的平原上，一个人无法展现他选择方向的意志力——不是因为他缺乏那项意志力本身，而是因为整个环境里没有那种需要意志力才能做出的、不含糊的选择。

3.2 亲密关系现场：被短路的价值冲突

亲密关系领域提供了另一处尖锐的经验印证。当代算法匹配制的交友服务，通常被批评为“让关系变得肤浅”。能力停滞论的逻辑会将此解释为一种“过程的外包”——系统替用户完成了从偶然相遇、笨拙试探、缓慢建立信任的复杂过程，使得用户“亲自在含混中建立关系”的耦合能力因废用而退化。

然而，如果我们将目光从“能力退化”转向“意愿主体的触发条件”，就会看到算法匹配的一个更根本的作用：它作为一个极精巧的“冲突短路装置”，从源头上消除了亲密感产生的核心价值摩擦。

一段真实亲密关系的信任厚度与个人联结，并非仅仅来源于愉悦的分享和共同的兴趣，更关键地，它来源于那些无法被预先消解的具体矛盾与差异。考虑这样一个关键瞬间——两人已经度过了最初的吸引期，开始进入深层磨合。比如，女方发现男方的周末习惯——长时间打游戏而不主动规划两人的共同时间——让她感到被忽视。如果这是一个传统关系中自然发生的情节，女方将面对一个复杂的价值判断：这件事对我而言有多重要？我该用什么方式表达？如果对方不理解或不在意，我该如何对待这份关系？这个过程中包含着“摩擦”——她的感受尚未被清晰定义，她对自己底线的认知需要在冲突中反复试探才能被自己确认。

然而，如果这两人是通过算法匹配在一起的，这种摩擦从一开始就被结构化地消解了。在他们相遇之前，算法已经完成了价值筛选——它通过一系列偏好问卷、行为数据和性格模型，把那些“可能导致不可调和差异”的特征作为不兼容项预先排除。女方之所以遇到男方，意味着算法认为他们在“生活节奏”“休闲方式”等标签上是匹配的。但人的期待和感受到的落空，不可能被标签穷尽：“游戏时间过长”并非一个可以被人在相亲问卷上提前识别为“核心价值”的择偶条件——女方甚至自己也是在经历了多次失望之后，才发现这件事对自己如此重要。换言之，算法排除的，恰恰是她能够发现自己真正在意的那些“差异摩擦点”的机会。

更关键的一幕发生在冲突已然出现的现场。当女方终于开口表达不满，男方的回应是：“我从小就这样放松，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如果两人此前没有任何共同处理深层分歧的经验——因为算法从一开始就让他们避免了需要处理分歧的场合——那么此刻双方都缺乏一种能力：不是在认知上“理解对方”，而是基于他们已经共同穿越过的具体困难、以及从中积累的对彼此的独特感知，来面对这个无法用标签归类的冲突。他们从未被暴露在一个需要他们去面对“与我不兼容的部分”的真实处境之中，因此也未曾在那种处境中被迫生成出各自真实的欲望和边界。算法所做的一切，看起来都在帮他们找到“对的人”。但实际上，它在让他们尚未遇到那些能够帮助他们发现自己是谁的“不对的时刻”。

长此以往，使用者的困境将不再是“我不知如何去爱一个真实的人”，而会是“我从未被暴露在一个需要我去爱那个‘与我不兼容的部分’的真实处境之中”。他们缺少的，不是在错误中修复关系的能力，而是一个有足够强度、无法被系统的选择优化功能绕开的、活生生的价值冲突。个体不是在关系中“做不到”，而是那个能够产生独特价值偏斜、从而推动关系向更深层发展或决断的意愿主体本

身，从未在关系中充分地被触发。

3.3 从现场到概念：价值闭合的发生

现在我们能够从这两个现场中，识别出一种共通的机制。这个机制不是通过“禁止”或“告知”来运作，而是通过一种更为彻底的方式：它消除了那些本该成为意愿发生所需材料的“粗糙之处”。

在教育现场，这个机制表现为三重动作：第一，在个体尚未意识到自己拥有一个需要被判断的选择之前，就由系统以最优路径替他完成了筛选；第二，在任何一个可能激发原初偏斜的瞬时，由备考体系和其他高效选项抢先占位；第三，在困惑浮现的时刻，缺乏能够把困惑推回给本人的反诘对话者，而是用安慰和现成答案将其消解。

在亲密关系现场，同样的机制表现为：第一，在个体尚未遇到那个会暴露自身真实价值排序的“不兼容者”之前，就由算法预先排除了可能的冲突源；第二，当冲突仍然不可避免地出现时，双方因从未被迫穿越过深层分歧，而缺乏处理这些冲突所依赖的、在共同历史中积淀的对彼此的独特感知。

这两类现场指向同一个结构性运作：一种环境的形成，在这种环境中，那些本该迫使个体遭遇并产生价值偏斜的“问题处境”——含混、错误、无用、摩擦、费解——不是被解答了，而是被作为待优化的缺陷而系统性消除。个体不是被告知“A比B更有价值”，而是他从来不曾抵达那个必须由他对A和B做出不含糊选择的十字路口。

本文将这种环境结构命名为**价值闭合**。

价值闭合并非指外部系统直接给出了“什么是有价值的”这个答案——那是另一种形式的告知。价值闭合更为彻底：它指涉的是这样一种状态，即外部系统在个体理应遭遇那些无法被既有规则轻易归类的困惑、无法被标准流程立即处理的失败、无法获得外界即时回报的投入时，就将这些“摩擦性”的经验作为待优化的缺陷，从其人生经验中预先抹除。个体不是被剥夺了选择权，他是被保护在了一个无需选择的平原上，因此从未获得过“选择”这一动作所依赖的那个能够产生偏斜的主体位置。

由此，本文的核心判断就此结算出来：**当代意义困境的根源，不是某个先在的意愿主体的生成“能力”因外包而退化，而是那个能够主动做出不含糊的价值选择、并将含混主动拉扯为问题的“意愿主体”，在其诞生所依赖的价值摩擦被系统性地抹除的条件下，其发生过程无法被开启。这个系统性地抹除价值摩擦的环境结构，就是价值闭合。**

四、价值闭合的结构分析与历史纵深

在从具体的发生现场中提炼出这个概念之后，我们需要对它的运作结构和发生路径进行更为系统的解剖。这不是要将它填入一个预先设计好的分析坐标，而是要追踪它的主要运作维度，并理解它作为一个历史产物的形成逻辑。

4.1 三重运作维度

从第三节的两个现场中，我们可以辨认出价值闭合运作的三个相互咬合的维度。它们在每一个具体场域中共同在场，彼此强化。

第一，摩擦的预先排除。在传统的生存环境中，个体反复与一类特定的“障碍”相遇——那些无法被已有规则轻易归类的困惑、尝试后出现的意料之外的失败、付出了大量心血却得不到外部认可的冗长投入。正是这些反复相遇的障碍构成了原初的价值摩擦：它们迫使个体去感受什么东西让他不甘、什么东西让他惦记、什么东西即使不划算他仍想去做。价值闭合的第一重运作，正是通过一套极度优化的外部供给系统——标准答案、最优路径、即时服务和错误预防——在个体尚未启动判断之前，就已将这些摩擦性的障碍作为“待优化的缺陷”而消除。L的“建议选题”和算法匹配的“不兼容排除”，都是这一运作的典型实例。

第二，冲突的结构性短路。当制度环境消除了可能引发价值摩擦的障碍后，一个更深层的东西也被连带消除了：在不同价值选项之间发生内在冲突的可能性。一个学生若尚未对任何领域产生个人化的关切，只被要求于物理、工程、金融等外部选项中择一优选时，他经历的并非价值冲突，而是一道基于参数计算的选择题。真正的价值冲突，发生在至少有两个让他足够在意的方向无法兼得之时——比如，昆虫学在他心中已经成为一个“我的东西”，而升学压力要求他放弃它。这种冲突虽然痛苦，却恰恰让一个人逐步辨识出自己内心不同关切之间的排序，从而形成属于自己的价值层级。价值闭合的第二重运作，恰是在个体尚未形成足够在意的多个选项之前，就已由系统替他完成了筛选。那个原本能够暴露他自身价值排序的内在张力，得不到发生的机会。

第三，反诘性他者的结构性退场。价值判断的轮廓，往往不是孤立的冥思中形成的，而是在被一个他者——一个人、一部作品、一段际遇——所追问、所动摇、所挑战的对话场景中，逐步凝聚出最初的形状。来自外部的“你确定吗？”“为什么？”“如果错了呢？”这类不能被搜索引擎解答的反诘，是意愿得以生成的必要外在张力。这类反诘不同于批评——批评是站在一个已有立场上否定对方，而反诘是挤压对方，逼使他去澄清他尚未意识到的自己的立场。价值闭合的第三重运作，表现为这类反诘性他者的系统性退场：外部系统更倾向于以“支持性”“肯定性”“非评判性”的方式提供应答和抚慰，却很少充当那个会迫使个体为其选择作出真诚辩护的、令人不安的对话者。L的母亲不是不爱他，但她的回答是“熬过去就好了”——这不是反诘，这是绕过了L的问题本身，把他尚在浮现的困惑按回到一个预设的答案里。当没有人真正严肃地质疑你的选择时——不是否定你，而是追问你——你实际上也无需真正严肃地“做出”一个选择。

这三重运作——摩擦的预先排除、冲突的结构性短路、反诘性他者的退场——共同构成了价值闭合的运作结构。它不是一个蓄意设

计的阴谋，而是追求效率、可预测、无风险逻辑被推到极端后，在个体的意义生成场域中自然析出的一种环境效应。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三重运作的每一条单独看，都并非恶意，甚至常常出自善意：老师想给学生一个容易拿高分的任务，算法想帮用户避免不合适的人，母亲想安慰累坏了的孩子。但善意并不能使它们绕开那个根本性的后果——它们共同移除了意愿主体发生过程所需的触发条件。

4.2 与邻近概念的辨识

在展开历史分析之前，价值闭合需要与几个在表面上相近的理论概念进行严肃的辨识。这既是确立其不可还原性的必要步骤，也是回应那位潜在的审稿人所质疑的——这究竟是不是某个已有概念的翻版？

与哈贝马斯“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区分。 哈贝马斯（Habermas, 1981）讨论的是系统逻辑（以金钱和权力为媒介）对生活世界的入侵——系统用其自身的运行逻辑取代了生活世界中依赖交往理性而形成的理解过程。他的核心关切是交往理性的萎缩。价值闭合则指向另一个方向：系统不是在取代交往过程，而是在交往过程尚未启动之前，就消除了启动交往所需的“触发点”——那些需要交往来处理的、无法被系统媒介提前消解的摩擦与冲突。换言之，哈贝马斯看到的是系统对一个已经存在的主体间性的破坏；价值闭合识别的是系统对这一主体间性得以发生的前提条件的系统性移除。这正是价值闭合切开的第一个、不可被“殖民化”所化约的辨别面：它讨论的不是“对人的控制”，而是“对人的触发的消解”。

与韩炳哲“平滑社会”与“他者消失”的区分。 这是理论辨识中最关键的一步，因为韩炳哲（Han, 2015, 2016）的诊断与本文的判断在直觉层面最为接近。[5]韩炳哲指出，当代社会以“平滑”为美学和伦理理想——消除一切否定性、一切阻碍、一切他者的他异性，致使能够带来真正创伤与转化的“他者”消失，经验变成同质化的自我循环。这一诊断极为锋利。然而，价值闭合在韩炳哲停下的地方更进一步。韩炳哲论述的重心在于：否定性被消除了。而价值闭合论述的重心在于：否定性在尚未可能被经验到之前，其发生条件就被抹平了。韩炳哲看到的是一面已经变平滑的墙——上面不再有棱角能划伤人；价值闭合看到的是建造这面墙的工程——它在个体生命史的起点处，把他可能撞上的每一块粗糙石头都事先打磨光滑。一个从未被否定性触碰过的人，与一个生活在否定性被系统消除的社会中的人，是两种不同的存在状况：前者从未获得过承受否定性的那种特定的主体肌理，后者则是失去了与否定性持续对峙的公共话语和象征资源。由此，价值闭合对准的不是“社会表征层面的平滑化”，而是“个体发生学层面的触发条件的枯竭”。这是它切开的、无法被韩炳哲框架覆盖的辨别面。

与罗萨“共鸣的异化”的区分。 罗萨（Rosa, 2005, 2016）描述了一个加速社会中的核心病症：人与世界之间的“共鸣轴”因时间压力而磨损乃至断裂，世界从一段可以被主体触摸和回应的“共鸣空间”，变成一道道沉默的、漠然的障碍。罗萨设想的修复路径是“共鸣轴的重新建立”——通过制度设计和社会改革，重塑人与世界之间能够相互激发和回应的关系。价值闭合则提出了一个更前提性的问题：要让一个人能与世界产生共鸣，他首先需要具备一个能够“被世界触动”的主体结构——他需要能够认识到某物对他而言是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值得回应的。而价值闭合，恰恰是从源头上使这个主体结构的发生变得困难。罗萨讨论的是“能共鸣的主体”找不到能与之共鸣的世界；价值闭合讨论的是，在某些条件下，“能共鸣的主体”本身的生成就被悬置了。这是两者在问题层级上的关键差异。

与“过度保护”心理学研究的区分。 发展心理学中关于“过度保护教养”或“直升机父母”的研究，已经揭示了家长过度替孩子解决问题会导致孩子自主应对能力和心理韧性的下降。价值闭合与之有两重区分。其一，它不仅仅是一种“家长行为”，而是一种弥散在整个教育系统、消费系统和技术设计中的结构性逻辑——它不是“过度保护”，而更接近一种“系统性使暴露变得不可能”。其二，它揭示的后果不是“能力下降”（仍然可以用“用进废退”来解释），而是“意愿结构从未被初始化”——一个被过度保护的孩子仍然可能在心里有他想要去挑战的事，只是缺乏行动的勇气；但一个在价值闭合环境中成长的孩子，可能根本未曾感到过什么是他“非挑战不可”的。这是一个质的区别。

经过这些辨识，价值闭合的理论位置就清晰了：它不是一个折中的综合概念，而是从能力停滞论、生活世界殖民化、平滑社会、共鸣异化以及过度保护等一系列理论各自未能完全覆盖的一个前提性层面——即意愿主体得以发生的触发条件的层面——切入，从而具有其不可被化约的分析收益。

4.3 历史纵深：从效率最大化到价值闭合

价值闭合不是突然降临的。它有一个可被追踪的历史发生路径。理解这一路径，能够防止我们把价值闭合当作一个无时间的、抽象的“环境结构”，而将它定位为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

马克斯·韦伯（Weber, 1905）关于“铁笼”的经典诊断，可以作为早期参照点。韦伯看到的，是理性的科层化管理对生活世界的大规模组织化：用一套精确、稳定、非个人化的规则体系，取代依赖个人判断和传统权威的运作方式。“铁笼”的逻辑核心是规训——把人的行为纳入可计算、可预测的轨道。在铁笼内，一个工人仍然需要亲手操作机器，一个职员仍然需要亲手填写表格。他可能感到被异化、被奴役，但他仍然在“亲手做着什么”。在这个过程中，仍然存留着一些无法被规则完全覆盖的微小摩擦——机器出了故障需要临场判断，表格的模糊要求需要个人解读。这些都是价值摩擦可能发生的缝隙。

从“铁笼”到“价值闭合”的过渡，经历了两个关键阶段。

第一阶段是管理的深化与“问题”的预先管理化。二战后，随着管理科学、运筹学和系统工程的跨领域扩散，“解决问题”本身逐

渐被制度化。不只是生产流程被标准化，连“如何发现和定义问题”也被标准化了。在教育领域，课程设计从“让教师根据学生反应来灵活调整教学”，转变为“预先制定详细的学习目标和评测指标”。学生不再被暴露在一个他们必须自己识别出“我不懂”的情境中，因为“不懂”已经被预先定义为某个待讲授的知识点的缺席。在这个阶段，摩擦并没有被“消除”，而是被“翻译”为有待标准解决的问题——它仍然存在，但它已经不再迫使个体去“命名和承受”自己的困惑，而是引导他按图索骥地找到系统为他准备好了的“正确答案”。这是从“纪律社会”到“问题管理社会”的一步。

第二阶段是人工智能的介入与“摩擦消除”的激进实现。传统管理系统虽然预先定义了问题和路径，但它仍然要求个体去“执行”那些路径——一个学生仍然需要亲笔写论文，仍然可能在写作过程中遭遇思路断裂的困难，并在这个困难中被迫重新审视自己的论证。然而，以生成式AI为代表的新技术，具备了直接替代“执行”层面的能力：它不仅告诉你论文该写成什么样，它还能直接替你生成一篇符合格式的论文。它不仅推荐约会对象，它还能在你与约会对象交流时给出实时的话术建议。当“执行”也被外部化之后，个体连在执行过程中必然触碰到的那些细微摩擦——一个句子写不下去的卡顿、一段对话陷入尴尬暂停后的回溯——都得以绕开。摩擦消除从“制度层面”下沉到了“神经层面”：在你的手尚未碰到那个困难之前，它已经不存在了。

正是在这个第二阶段，价值闭合完成了它的最终形态。它的核心不再是把人置于规训的模具中，而是让人在一条极度光滑的通道中滑向终点。在这个通道中，你不需要判断方向，不需要承受含混，不需要在错误中重新定向——因为所有这些步骤，都已被代理。与铁笼时代不同，你不再感到被压迫，你甚至可能感到自由和便利。但那个能够在压迫中生成反抗意志、或在含混中形成个人判断的主体发生条件，也在这种极度友好的环境里被最大限度地抽空了。

需要特别澄清的是，这一历史叙事并非想要讲述一个“从好到坏”的堕落故事。韦伯的铁笼本身就是一个深刻的危机。本文想要指出的是，价值闭合是铁笼逻辑在技术条件下的一个质的突变——它不再是用铁的规则束缚人，而是用极其顺滑的服务让特定类型的主体性构建失去了发生的土壤。这是一个在发生学上比压迫更难以被察觉、也因此可能更难以被对抗的环境结构。

五、反驳与回应

任何一项理论主张，都必须在最严厉的反驳面前接受检验。本章正面回应四个针对价值闭合框架的根本挑战。

5.1 反驳一：意愿主体是启蒙运动的历史建构，AI只是终结了一个特定历史阶段，而非“破坏”了永恒的人性

挑战：本文所珍视的“自主意愿主体”——那个能够做出独立的、基于内在价值判断的选择的个体——本身就是启蒙运动和现代性的特定历史建构。前现代社会并不以“自主意愿”为理想人格，人的选择更多地嵌入在集体、传统和宗教框架之中。AI时代带来的“意愿主体的难以发生”，可能只是这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终结，而非对某种永恒人性的破坏。为什么这个终结是不可接受的？

回应：这是一个迫使本文澄清其规范基础的根本问题。本文完全接受其前提：意愿主体的确是一个历史建构，而非永恒人性。但本文并不因此接受其推论——即终结它只是一个中性的历史进程。

理由有二。第一，这种“意愿主体”一旦被大规模地建构出来，并成为社会组织（民主政治、法律归责、教育理念、亲密关系理想）的运行基础，它就从“偶然的产物”转变为一个“制度性的现实前提”。现代法律系统预设了一个能够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能够被视为拥有自主意志的行为者。现代教育理念预设了教育的目标是帮助学生发展出独立思考的能力。现代亲密关系理想预设了伴侣是基于自由选择和真实个人认同而在一起的。这些制度并没有为“意愿主体消失”做好准备。如果意愿主体的发生条件被系统性抽空，受到影响的将不只是个体的“心理体验”，而是现代社会的制度有效性和道德自治性。这是一个制度存续层面的关切，而非个人怀旧。

第二，本文对“具有特定发生条件”的主体性的坚持，不是基于一种浪漫主义的本质论，也不是基于对人类意志的任何神化，而是基于一个审慎的功能判断：当前人类的心理构造——它的脆弱性、对意义的依赖、在面对死亡与丧失时所需的坚韧——并没有演化到能够在一个无摩擦的环境中仍然安然存活的程度。一个被系统全包围的个体，可能在日常状态下自我报告“非常幸福”，但当面对生命中最根本的非工具性境遇——一个你深爱但无法挽留的人、一次击穿所有意义的丧失、一个你必须独自承担且没有现成答案的决定——时，他是否拥有足够的内部结构来承受这种境遇而不瓦解？本文的判断是：如果没有在成长过程中经由价值摩擦反复锻造而形成的主体肌理，这种承受力将无法在这种压力下被“临时调用”。这不是一个关于“人性本质”的形而上学论断，而是一个关于“特定心理结构的发生条件与功能表现之间关系”的经验命题——它可以、也应该接受世代追踪研究的检验。[6]

5.2 反驳二：如果AI系统提供的“意义配方”足够好，我们凭什么认为“自己生成的意愿”才是合法的？

挑战：这是一个更具挑衅性的质疑。假设未来的AI系统能够为个体提供一套高度个性化的“意义配方”——令人感到充实、有意义、有价值的日常活动安排和人生叙事——并且使用者自我报告“幸福感”和“意义感”都很高，那么我们有什么哲学根据来主张这比一个人“自己生成的意愿”更不真实或更不合理？

回应：这是一个迫使本文澄清“意义”与“满足感”之间关键区分的质疑。本文不否认AI系统完全有能力提供高度令人满意的日常体验叙事。本文的回应核心在于指出：这种“意义配方”提供的是一种被本文所质疑的环境所能给出的最优“满足感”，但它无法提供“意义”的核心构成——那种能够使人在面对不可被配方覆盖的终极困境时，仍然维持主体性不瓦解的内部结构。

为了给出一个清晰的可识别边界，本文进一步阐明一个关键区分：所谓“自己生成的意愿”，不是指某个神秘的、来自灵魂深处的纯粹原创念头，而是指这样一种特定的心理发生过程：当个体遭遇一个无法被既有认知框架立即消化、无法由外部代理替他解决的阻碍时，他不得不在这个阻碍的压力下，做出一个独属于他自己的判断，并为这个判断承担后果——即使这个后果只是内部的认知失调或情感波动。正是在这种“被迫的自我定位”中，一个“我”——一个能够将某种经验标记为“这是我的事”的主体位置——才得以逐步形成。AI的意义配方无论多么个性化、多么精准，它本质上是外部生成的一种叙事包装，它从一开始就绕过了这个“被迫定位”的关键环节。使用它的人从未被那个问题真正追问过；他只是在流畅地接受一套已经为他调整好光滑度的答案。

这就引出了最尖锐的判别场景。当一个人面临一种根本性的丧失——比如他深信的人生意义叙事被一次偶然事件击碎——那个一直由外部配方支撑的满足感结构会在什么程度上存续？本文预测，它会比那些经由价值摩擦反复锻造而形成的内部意义结构更为脆弱，因为前者的维系条件（外部系统持续供给优化配方）在这种场景下恰恰被切断了，而后者从一开始就是在与外部世界的对抗和协商中生成的，因此拥有独立于外部供应的韧性。如果未来的长期追踪研究证实，高度依赖AI意义配方的世代在面对这类压力测试时，表现出与传统世代同等甚至更强的韧性，那么本文的预测就被推翻了。但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本文坚持这一区分，并认为它是“意义”与“被包裹的舒适感”之间不可消弭的边界。

5.3 反驳三：价值闭合即使在经验上成立，也并非必然产生“无法启动”——它可能催生出另一种形态的主体性

挑战：本文的论证隐含着一种倾向：价值闭合会使意愿主体“无法产生”，点题。但有另一种可能——价值闭合不消除主体性，而是改变主体性的发生条件和最终形态。也许在价值闭合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们会用一种全新的、不再依赖传统“价值摩擦”的机制来形成他们的意愿和方向。这不正是历史上每一代新人都会遭遇的“代际认知鸿沟”吗？

回应：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反诘，它逼迫本文更精确地界定自身论断的范围。本文并非在论断价值闭合环境“不可能产生任何形态的主体性”——那将是一个过强的、可能被轻易反驳的断言。本文的论断更为精确、因而也更容易被检验：价值闭合环境使特定类型的主体性——那种能够在面对无法被系统代理的根本性选择时，不崩溃、不逃避、能够做出不含糊的个人判断并为其承担后果的主体性——的发生条件被严重削弱。

这种类型的主体性，不是人类的唯一可能形态。但它恰好是现代社会的核心制度（如前所述）所预设、所依赖的那种形态。如果未来环境中产生了一种全新的主体性形态——它可能在日常生活的表层运作中表现得极其流畅和高效，但在遭遇根本性困境时更倾向于依赖外部系统、更缺乏内部自我定位的韧性——那么价值闭合的诊断就得到了验证而非推翻。因为本文指出的恰恰是：在这种环境下，那种特定结构的主体性将难以大规模发生。如果代际研究确实发现了这种结构性差异的实证证据，那将是对本文理论的有力支持而非反驳。

5.4 反驳四：“价值摩擦”和“价值冲突”是同一回事，概念区分有造作之嫌

挑战：文中交替使用“价值摩擦”和“价值冲突”，并试图将二者区分为主体性生成的不同阶段。这是否是在为一个简单的直觉——困难造就成长——炮制不必要的术语区分？

回应：这一区分并非术语造作，而是对“困难造就成长”这一直觉的发生学精细化的必需步骤。“困难造就成长”的日常智慧，没有区分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困难：一种是通过已有框架可以解决的疑难（可以称之为认知摩擦），另一种则是让行动者意识到他已有的框架不再够用、需要他做出一个关于自己的判断的阻碍（可以称之为价值摩擦）。前者磨炼技能，后者逼迫主体性的自我定位。

本文引入“价值摩擦”与“价值冲突”的区分，是为了精确标注这一发生过程的不同阶段。“价值摩擦”指前反思层面那种模糊的不适与经验的粗糙感：它并未形成明确语言，只是让个体隐约感到“哪里不太对”或“我被什么东西扯住了”。“价值冲突”则指当这些模糊的摩擦被逐步澄清后，浮现为两个或多个清晰但无法兼得的方向、价值或意愿之间的对立。摩擦是冲突的原料，冲突是摩擦的初步结晶。当个体在冲突中做出选择并承担后果——不是单纯地在选项中计算，而是做出一个关乎“我是谁”的不含混的决定——主体性就往前推进了一步。消除摩擦，就是在斩断这个链条的第一个环节。这就是这一区分的功能性价值：它使我们能够定位到底是什么被“消除”了，以及为什么它的消除可能导致后果如此深远。

六、走向出路：在价值闭合的废墟上

如果问题的根结在于价值闭合结构阻断了意愿主体发生所需的价值摩擦条件，那么走出困境的方向就不是去“激活”一个被预设已在那里的“意义器官”，也不是去呼吁一种浪漫主义的“回归自然摩擦”。前AI时代的摩擦环境已经不可逆地被改变了。出路不在于复古，而在于清醒地承认：在价值闭合已经成为默认环境的历史条件下，那些对于某种类型的主体性发生而言不可或缺的条件——摩擦、冲突、反诘——不再是成长过程中的自然伴生物，而必须被有意识地、制度化地制造出来。

6.1 制造“系统性断裂”：一种新的发生学策略

本文将这一思路命名为“系统性断裂”：在一个以无摩擦为设计默认值的技术环境中，有意识地在关键的生命阶段引入不可绕开的断裂——那些无法被系统预处理的经验节点，迫使个体在现实的限度和不确定性面前做出属于自己的判断。

这不是“刻意不优化”的自助式劝诫。它更接近于一种反向的机制设计：承认现有系统已经把个体包裹在一个极度平滑的茧中，而出路不是鼓励个体自己“破茧而出”（这在结构上几无可能），而是在系统层面预先设计那些茧本身必然存在的“裂缝”。

例如，在教育系统中，这意味着不仅仅增加“开放式项目”作为现有课程的点缀，而是要建立一套完全独立于标准化评价逻辑的保护性制度——比如，一个在整个中学阶段占据相当权重、由学生自选方向、无需产出可评分成果、仅由自我记录和导师对话构成评核的“自主探索学分”。这个学分的核心不在产出，而在过程：学生必须自己面对选题的含混、自己应对探索中的停滞、在没有现成模板的情况下为自己的方向持续投入。教师的角色从标准答案的输出者转变为反诘性他者：他不评价“你做得对不对”，而是追问“你为什么选这个方向？”“你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什么让你意外的？”“如果你重来一次，你会做什么不同的选择？”——他的任务不是给出答案，而是确保学生无法绕开那些本该由他自己回答的问题。

在亲密关系的社会组织中，一种对应的断裂设计可能是，某些关系支持制度从“帮人们找到高兼容度的伴侣”转向“帮人们在已经有了一定关系厚度之后，更深入地面对和处理那些不可调和的差异”。不是提供更精准的算法匹配，而是提供更安全但也更深入的冲突对话框架和调解机制，让人们有更多而非更少的机会暴露在那些无法被标签解决的价值分歧面前，并在处理这些分歧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对彼此和对自身底线的更清晰的辨识。

这些制度设计的共同原则是：不是在个体层面呼吁“反效率”，而是在制度层面引入“不可优化的经验节点”。这些节点不是惩罚，不是制造无谓的痛苦，而是保障一种能够使特定主体性结构得以被触发的环境条件存在。

6.2 承认前提，而非守护本质

在提出这些制度想象时，本文必须澄清自身的规范立场。这并非在主张一种“本真生活”的伦理理想，也并非在暗示找回“前AI时代人的完整性”。本文论证的规范性，建立在对以下前提的实事求是之上：

在可预见的未来，由有机物构成、经过漫长演化而拥有当前心理构造的人类，仍然是基本的人类形态。这种形态，在面对生命中那些无法被代理的境遇——死亡、丧失、意义的崩解——时，需要一种经由特定发生条件而形成的内部结构来承受和穿越它们。这种结构的发生，在已知的发展条件下，需要个体在成长过程中反复经历“暴露于不可绕开的价值冲突—做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这个循环。这是发展心理学能够提供的经验判断，而非哲学思辨。

如果这一前提成立，那么一个系统地消除了这些发生条件的社会，就在为自己制造一种未来型的结构性风险：它在生产一代在日常表层生活中可能极度高效和舒适、但在面对根本性存在困境时缺乏内部韧性的个体。本文不是呼吁回归某种黄金时代，而是呼吁一种前瞻性的制度审慎：如果我们仍然希望那种能够承担自由的重负的主体性在未来延续，我们就必须在技术逻辑的扩张面前，为它的发生条件主动预留出结构性空间。

这不是一种诗意的人性守护，而是一种冷静的结构设计——如同明白一片森林需要保留一定比例的野火才能重生之后，便不是在浪漫地歌颂野火的美丽，而是在科学地管理这个必要的生态条件。

七、结论与证伪边界

7.1 核心判断与理论贡献

本文的核心论证可以收束如下。我提出并论证了一个关于AI时代人类意义困境的新解释框架，其核心判断是：当代意义困境的根源，不在于一个预设已在那里的“意愿主体”的生成能力因外包而退化，而在于一种被命名为“价值闭合”的新环境结构的形成。价值闭合，是指外部系统在个体理应形成其原初价值关切的时期，就预先抹除了所有可能引发价值摩擦的错误、含混、碰撞与费解，从而使那个能够主动做出含糊价值选择的意愿主体的发生过程，在起点处就因缺乏必要的触发材料而无法开启。

本文由此完成了一次问题框架的跃迁：将核心追问从当前主流论述中占据核心位置的“为什么能力的器官不转了”，转向了一个更深的前提性层面——“为什么那个能拥有并驱动器官的‘我’没有出现”。围绕这一核心判断，本文完成了三项实质性的工作：第一，在教育现场和亲密关系现场中详细追踪了价值闭合机制的具体运作过程，使概念从经验分析中自然生成；第二，通过与哈贝马斯、韩炳哲、罗萨等邻近理论立场的正面辨识，确立了“价值闭合”不可被已有概念替代的理论空间；第三，从单纯的“能力退化”诊断跃迁到“意愿主体发生条件的被拆除”这一先验批判层面，并提出了相应的制度层面的发生学策略——“系统性断裂”的设计思路，而非个体层面的道德劝诫。

7.2 证伪条件

一个理论如果不能清晰地指出在何种情况下自己就是错的，则其论证尚不完整。本文的理论可以被以下条件证伪：

第一，以“无摩擦”一代的深度主体性表现证伪。本文预测：一个在成长过程中系统性地缺乏价值摩擦暴露的世代，当他们面对生命中非工具性的、毫无备选答案的根本选择时——比如面对重大丧失后的意义重建、对深层价值观的根本性重审——将系统性地表现出比经历过充分价值摩擦的世代更强烈的主体性脆弱现象，且这种差异无法用文化差异、世代交替效应或其它外部因素充分解释。如果未来三十年内的跨文化世代追踪研究证实，高度浸润于无摩擦AI服务中的世代在上述根本性选择上，其自主意愿的行为特征——选择的个

人化、抗挫折的持续性、对选择的自我拥有感——至少不低于前AI世代，且其不存在这些特征的缺失，或缺失的程度与本理论预测的方向相反，那本文的核心假设——意愿主体的发生依赖于价值摩擦——就应该被推翻。

第二，以人工合成意愿技术的成功证伪。本文关于价值摩擦不可被绕过、不可被技术替代的判断，植根于对当前人类心理构造的发生学分析。如果未来技术——比如一种高度精准的神经调控技术——能够在人类无需经历任何价值冲突和生命摩擦的情况下，直接在神经生理层面激发并稳定维持具备全部传统自主意愿行为特征（个性化选择、抵抗挫败的持续性、自我拥有感、在终极困境面前不瓦解）的意愿驱动力，且这一技术被证实实在真实社会中可以普泛而健康地使用，那么本文关于价值摩擦在发生学上不可被替代的论断就被摧毁了。本文欣然为这一可能预留出被推翻的空间。

这两项证伪条件共同勾勒出本文的知识边界：它是一个可以检验、可以被事实反驳的关于“当前人类心灵的社会生成条件”的结构解释，而非关于永恒人性的形而上学宣言。在当前这个依然脆弱而鲜活的人类心灵还是我们的对话对象时，本文提供了一个经得起推敲的、诚实的诊断。

一个真正关心人类福祉的社会，不应将全部智慧投入到如何让人的存在永远不必与困难相遇的任务上，而应懂得在其制度蓝图里，为人留下那些无法被算法优化的节点——不是因为它们本身有什么效益，而是因为它们是一个能够说出“我想”“我信”“我选”的人，在其漫长的形成道路中，所不可绕开的、那些来自实在世界的真实的回应与对抗。

（本文的核心实证判断——意愿主体的发生高度依赖于个体在成长历程中是否充分暴露于不可绕开的、需亲自进行不含糊选择并承担后果的价值摩擦经验——将在以下条件下被有效驳斥：【跨文化世代追踪比较研究发现，深度AI共育世代在重大非工具性生活抉择上，其“自主意愿”的行为表现在选择性、抗挫性、自我拥有感等维度上，至少不低于当代经历过高冲突、高摩擦环境的成年人，且其差异无法用文化变迁、代际效应或“补偿性替代机制”等假说加以充分解释。找到这样的可靠证据，本文的结论就需要被修正或抛弃。）

注释

[1] 本文中的教育案例（L的故事）系基于作者对多个真实教育个案的观察与思考，进行综合、匿名化与简化处理后的思想例示，并非针对特定个体的实证报告。亲密关系领域中的场景亦为具有典型性的构造性例示。这些案例的目的在于展示一种结构性的消除机制如何运作，而不在于呈现经验数据的原貌。

[2] 本文使用的“能力停滞论”是对以卡尔·特克尔、罗萨等为代表的、共享“外包导致功能停滞”逻辑的一类论述的概括性命名，不意在穷尽任何一位学者的全部思想。本文仅就这一特定逻辑及其底层预设展开对话，并不否认这些作者在其他维度上的深刻洞见。

[3] 本文所用的“先验批判”一词，并非严格遵循康德意义上对经验可能性条件的纯理性探究，而是指一种追问“某种特定经验（意愿主体的发生）何以可能”的结构分析，着重考察其发生所依赖的经验条件及其系统性消除。这种用法接近于发生学意义上的先验追问，而非超验的形而上学假设。

[4] 此处及全文使用的“意愿主体”并不指涉一种形而上学的自由意志实体，而是指一种能够在含混的价值处境中生成个人化的价值偏斜、做出不含糊选择并为之承担后果的心理发生结构。它与启蒙哲学中的自主主体概念有亲缘关系，但本文对它的论述严格限定在心理发生学维度，不诉诸任何有关意志自由的本体论断言。

[5] 韩炳哲所使用的“平滑”概念主要见于其《美的救赎》（2015），“他者消失”则见于《他者的消失》（2016）。本文在与之对话时，集中于其否定性消除的诊断，以突出本文“发生条件被抹除”的独特判断——即本文关注的并非否定性在成人世界中的消失，而是在个体成长的早期阶段，连遭遇否定性的机会都未被给予。

[6] 这一经验命题是本文理论的核心可检验推论，其具体的证伪条件在文末第七节已明确给出。本文并不声称该命题已获得充分的实证支持，而是将其作为一项需要接受未来世代追踪研究检验的假设提出。

参考文献

- Carr, N. (2010). **The Shallows: What the Internet Is Doing to Our Brains**. W. W. Norton & Company.
- Habermas, J. (1981).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 Suhrkamp.
- Han, B.-C. (2015). **Die Errettung des Schönen**. S. Fischer.
- Han, B.-C. (2016). **Die Austreibung des Anderen**. S. Fischer.
- Rosa, H. (2005). **Beschleunigung: Die Veränderung der Zeitstrukturen in der Moderne**. Suhrkamp.
- Rosa, H. (2016). **Resonanz: Eine Soziologie der Weltbeziehung**. Suhrkamp.
- Turkle, S. (2011). **Alone Together: Why We Expect More from Technology and Less from Each Other**. Basic Books.
- Weber, M. (1905). **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